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纪律形成研究

赵建国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委及其负责人不可随便发表意见,并先后两次发表“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指示,规定对外宣传必须事前请示,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并由宣传部领导“一切对外宣传工作”。这是至为重要的宣传纪律,有助于统一全党思想、政治和组织,并在宣传战中战胜敌人,为赢得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不断强化宣传统一性,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呈现鲜明的纪律化、规范化和组织化特色,为宣传制度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统一对外宣传”;事前请示;宣传部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5)05-0005-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314)

全面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抗日态度日趋消极,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导致国共关系和抗战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在此情形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应“更广泛与更深刻地展开反敌伪的宣传战”^[1];另一方面针对国民党两面性政策和虚伪的宣传战术,“必须展开对国民党的宣传战,以正全国人民的视听”^[1]。“政治形势之紧张,敌人谋我之尖锐,党派斗争之激烈”,要求“我党统一对外宣传”。职是之故,中共中央在 1941 年 5 月正式提出,“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由宣传部领导“一切对外宣传工作”^[2]。这是全面抗战时期至为重要的宣传纪律,不仅有利于贯彻党性原则,密切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之间的关系,而且对统一全党思想、政治和组织,赢得宣传战起到关键作用,有力配合了军事和政治斗争。不过,此处“对外宣传”主要指向“党外宣传”,即公开发表全国性宣言,与“党内宣传”相对应^[1],范围超越通常所称的国际传播或国外宣传^[3]。正如邓小平所言,“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和新闻通讯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4]。遗憾的是,刘江船、徐丙祥等研究者侧重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政策及其实践,却忽略“统一对外宣传”在宣传纪律建设方面的独特价值^[5-6]。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基础性史料,仔细探究全面抗战时期宣传纪律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制度保障,进而深入理解我党宣传的纪律化、规范化和组织化进程,为新时代宣传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统一对外宣传”的历史缘起

在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相当重视宣传纪律建设,要求党员“对外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尤其是在国民党中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完全接受党的“指挥和检查”。^[2]与此同时,各地党委必须执行“中央所指示的宣传口号”^[7],对外宣言“总的原则和态度不能逸出中央宣言之范围”^[7]。也就是说,各级党组织和所有党员的言论务必服从于党,“若任何级机关或个人有独立的言动者,一律以破坏本党纪律论”^[8]。伴随革命发展,这种严肃的宣传纪律不断强化,核心要义是听从中央指示,“不可随便发表意见”^[9]。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致力于“整理全国宣传和鼓动的工作成为一贯的系统”,逐步完善宣传报告制度,保障中央在宣传领域的权威^[2]。对于违反宣传纪律的行为,中共中央往往给予惩戒,《青

年实话》因为攻击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招致严重警告^[10]。由于高度重视宣传纪律建设，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8]。种种情形表明，中国共产党借助宣传工作，逐步打开革命新局面。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继续整肃宣传纪律，指示各级领导干部不得随意对外发表言论。193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规定，如果没有得到委派，政治局委员不能以政治局或全党名义对外发表文件^[11]。同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明确要求，书记处书记在对外发表重要文章、讲话和报告之前，必须经过“书记处集体讨论”，如以书记处名义对外发表电文，应经过“半数以上的书记签名同意”^[11]。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明文限定，没有组织委托，中央委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3]。这两份草案和一份决定，主旨大体相当，表明中共中央特别注意“防范高级领导人破坏纪律的行为”^[12]。

不仅高级干部受到严格约束，地方党委与领导干部同样不能随意发表意见。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拟定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宣传纪律问题：必须经过其他委员同意，党委负责人的重要文章及谈话方可发表；有不同意见时，党员可以向上级党委或直接向中央和党的最高负责人申诉，但不得“在党内党外有任何反对组织反对上级党委的言论行动”^[3]。这些规则和纪律保障了各级党委及其领导干部、党员在言论与宣传中的一致性，是政治纪律在宣传领域的具体化，较好执行我党的一贯主张：“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8]重视宣传纪律的原因在于，全面抗战初期政治工作一度受到削弱，带来各种弊端，引起党内干部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13]。

各级党委及其领导干部不仅不可随意表态，而且还应与中央保持一致，尤其是全国性宣言必须听从中央指示，这是全面抗战时期重要的宣传纪律、工作纪律和政治纪律，更是一种宣传策略，以便统一宣传口径。前述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明白指示，对于全国性时事问题，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在“得到中央决议及指令”之后，才能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意见^[3]。刘少奇在《党规党法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关于全国性的宣言，各地党委应根据中央的指示发表”，各书记处书记对外发表文章及谈话时，先由“其他书记”过目^[14]。这类规矩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宣传纪律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宣传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正如罗迈所说，“党内铁的纪律”就是“党内组织的服从”，组织服从的关键在于言行一致，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15]。

为保证思想和组织的团结，1941年2月，中共出台《中央关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指示的规定》，再次重申和细化相关规章：在没有得到中央、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指示之前，各将领和政治部一律不能发表全国性通电、宣言与对内普遍指示；在紧急情况下，各中央局及各级将领对外发表全国意义的宣言和通电，应事先请示中央意见，并与“党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步骤”保持一致。^[9]这是首次正式划定全国性通电和宣言的纪律性规则，为统一对外宣传指明了方向，初步奠定事前请示制度的思想基础。

值得提及的是，各地党报同样“不可随便发表意见”。《中宣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提出，各根据地一切报纸杂志必须掌握中央政策，遵守党的原则，防止“任何违反政策与原则的言论”^[2]。《解放日报》在改版过程中，毛泽东提醒道：“以后凡是新的重要的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须与中央商量……报纸不能有独立性……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独立性。”^[16]换言之，《解放日报》应该置于中央绝对领导之下，实行事前请示，这“牵连到工作制度，权力问题……为此，必须规定些条例。”^[16]相关规则和指令契合我党对宣传工作的最初设想，即“一切出版机构”完全服从中央^[8]，接受中央监督，不得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

遗憾的是，尽管中共中央三令五申，但依然有部分党员和干部违背中央政策，“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17]。比如，王明不经过中央同意，先后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严重威胁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18]。项英和袁

国平等人完全自成风气,很少向中央报告“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9],同时片面夸大皖南特点,不执行和不着重传达中央指示,“深深种下了尔后皖南惨败的根苗”^[19]。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战时情况复杂,各根据地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环境之下,这种独立和分散,造成党内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导致不少同志“事前既不请示,事后又不报告”,以至于在“某些行动中和宣传中”直接违反党中央和上级的决定。^[20]中央书记处曾批评山东分局负责人朱瑞,对中央指示不重视、不讨论,给中央和北方局的电报空洞,反映不出具体情况^[21]。皖南事变后,各方通电亦有与中央步骤不相适合的地方,表明“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能一致”。针对这类情形,中共中央形成非常清楚的认知:各地在全国性问题上随便发言,属于“不正常的现象”^[22]，“对党是没有益处的”^[17]。

全面抗战时期的严峻形势,导致各根据地陷入各自为政的宣传困境,迫使中共中央多次警醒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处理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时,不请示中央和擅自主张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9]。这一指导原则的意义非同寻常,既是重大宣传战略和宣传纪律,也是基本政治规矩,为统一对外宣传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最终被纳入中共七大党章,有效保障了全党意志、行动和组织的统一。

二、“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

全面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收获较大,但“严格地说来,党的宣传工作落后于革命的发展与党组织的发展是很远的”^[1]。对此,凯丰有比较深刻的反思:“宣传工作在抗战中的重要和作用,已为十个月来抗战的实践所证明。同时,抗战的实践,也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无论对国外或国内都做得不够,没有充分地使用宣传工作的武器,没有充分地发挥宣传工作的效能。”^[23]粟裕也指出:“由于过去不注意宣传,使我们的群众斗争、生产建设工作成绩不能传播出去。”^[24]尤其严重的是,宣传工作不断出现偏差,许多违反政策和中央指示的言论被公开广播,比如“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马日事变的估计,陈团起义的发表”等。这类“极端严重的现象”,如不迅速纠正,“对党对革命必有很大危害”,以“慎重处事”态度,统一对外宣传,可谓势在必行^[2]。为尽快扭转宣传方面“独立无政府状态”,中共中央首先致力于宣传制度和纪律建设。

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第一次指示,正式提出“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责同志”尤应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军事将领在没有得到中央军委许可之前,也不准对全国性问题公开发表意见。这是“统一对外宣传”方面最重要的文件,核心宗旨是重大问题听从中央指示,在中央未同意之前,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都不得公开发言。其基本精神与刘少奇所言“关于全国性的宣言,各地党委应根据中央的指示发表”大体相同,主要目标是确保各地服从中央政策和决定,维系“全党意见与步调的一致”,这在党的系列指示和文件中得到很好体现。

不过,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政策统一性和灵活性,一方面要求统一对外宣传,另一方面注意到各根据地之间的差异,明确指出“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其他根据地的广播的登载与否,应根据本决定第二项来审查处理,无选择的登载是不允许的”^[2]。也就是说,各根据地宣传工作既要坚持党性原则,克服“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绝对服从党的政策和中央,又应依据本地实际情况,选择性地刊载新闻稿件。加强纪律性不是为了减弱地方的积极性,而是要发扬有条理有系统的积极性。中宣部拟定的宣传工作基本原则,在强调必须掌握党的政策和路线之际,同样看重因地制宜,要求宣传工作必须“正确估计客观的环境”“区别各种不同情况”“循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道路进行”^[2]。

1941年5月,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和贺龙等,强调“我党宣传必须统一于中央的宣传政策之下”^[25]。同年6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郑重指出,宣传工作必须“统一在中央总的宣传政策领导之下”,严格保持言论和行动的一致,才能赢得宣传战,“如果各自为政的不履行中

央统一的宣传政策的方针,这是非常危险的”^[9]。同年7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告诫各级党委应“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严禁“对全国性问题的任意对外发表主张”。^[26]同年10月30日,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和左权等人,嘱告说“如阎投敌实现,我们不必急于发表意见,届时中央当有指示”^[25]。简言之,全党全军需要汲取张国焘和项英反抗中央导致身败名裂的教训,在统一意志、行动和纪律的旗帜下,团结成为有组织整体^[26]。这种统一给国民党要员留下深刻印象,吴国桢曾一语中的:“所有共产党的报纸,无论是在俄国、英国、法国、美国或中国印行,都完全相同。它们似乎都属于同一个人,同一个业主,像是出自同一个编委会的报纸系列。”^[27]

“统一对外宣传”指示发表之后,个别地方没有很好遵守。1942年晋东南新华社关于“电请阎锡山移驻我区及袁晓轩问题”的广播,就不太妥当,中央书记处特意致电彭德怀,指令加强控制,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对外广播“带有关系全国全党全八路军性质的文件电文”,必须事先请示中央^[2]。罗荣桓自我批评说,山东分局没有认真讨论和贯彻中央指示,部分领导人随便发表政治见解,甚至在《滨海时报》上提出“两条战略反攻、两条战略退却”的口号,违背党的纪律和政策,而且“这种例子在山东不少”^[21]。

为进一步警示全党全军,1942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根据地统一对外宣传”的第二次指示。该指示特别重视事前请示,要求各根据地领导在发表带有全国、全党、全军性质的文件、电文和讲演之前,必须事先征求中央同意,否则“一律不准任意发表与广播”,并责令各地“严加约束”报纸和通讯社,以免“有碍政治步调的齐一”^[2]。随后,中央书记处再次提醒各地党部及八路军、新四军负责人,应付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之时,“必须表现沉着态度,不可随便发表意见”^[9]。4月28日,刘少奇致电中央,批评山东根据地“对中央服从不够”,提议“加强党的建设,改造作风”^[21]。在相当程度上,统一对外宣传,使报刊符合党的政策,也是1942年我党改造党报的重要缘由之一,只有这样“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2]。

不过,在两次“统一对外宣传”指示发布之后,各地宣传依然发生若干不符合政策的事件。为此,毛泽东在1942年8月15日致电山东分局朱瑞,郑重指出:“常恩多事件,我们不应牵涉在内。你们替他发表新闻是不适当的,以后望注意。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21]与此同时,毛泽东分别致电陈毅、林枫以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和报纸的领导,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为保障报刊符合党的政策,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外宣传技巧,“在宣传方面,亦请注意向宣传人员说明,极力避免谈国民党坏处及做国共好坏比较”,并提及“范长江头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及广播,第三篇不适当,故未发表”^[1]。

中共中央两次明确指示,要求“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这是全面抗战时期极其重要的宣传纪律和指导策略,很好推动各根据地改进宣传工作。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山东军区通过《关于统一党报、党刊的决定》,由罗荣桓、黎玉、萧华等人组成党报委员会,加强对各类刊物的领导^[21]。粟裕在苏中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总结说,“为统一全苏中党的意志与行动及教育全党”,应“办一个党报”,改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24]。总体而言,加强宣传纪律,对于党的统一领导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促使“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14]。

三、“统一于宣传部”

为保障对外宣传的统一,中共中央在宣传队伍和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系列探索。1941年5月,中共中央将《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以实现宣传政策的一致^[9]。不过,最具影响力的举措是,将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统一于宣传部”。中共中央特意指令各地宣传部,积极消除宣传“无监督无政府”现象,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和区党委要经常检查落实这项工作,加强宣传领导权^[2]。换句话说,各地党委必须高度倚重宣传部,为宣传纪律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放宽历史视野,“统一于宣传部”可谓渊源有自,中共中央在建党初期就高度重视宣传部门。

1924年5月,中央宣传部成立,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强调说,“中央的各部之中”应当特别留意“宣传部和工农部”,要“从任何机关里征调最有力的同志”充实宣传部^[8]。在中共中央看来,中宣部是宣传与教育之“中枢”和“总汇”,是贯彻“宣传工作决议案”的主要关节^[7]。1939年5月,毛泽东在发言中凸显宣传部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六大方针要由宣传部组织具体的宣传工作……各地方党组织首先建立对外宣传机关,这甚至比建立党部还重要。”^[28]

由于“宣传工作的本身,也就是组织工作的一种”^[7],中共中央多次呼吁加强宣传部门的队伍建设。1939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委,增强“宣传部工作”,在宣传部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统一领导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大幅度提升“宣传费的比例”^[1]。次年10月,中共中央全面批判“重组织轻宣传”“把宣传工作看得可有可无”等错误思想,将宣传部与组织部视为同等紧要的领导机关,并拟定各级宣传部门的建设标准,培养专职宣传干部,确立宣传报告和巡视制度^[1]。这类情形说明,由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宣传,无疑是水到渠成的正确选择。

为确保宣传部的领导作用,1941年6月,中央宣传部再次督促各地党委,加强宣传部的机构建设。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明白指出,宣传部和组织部是“我党工作中两个有机的部门”,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应该“在各级党的组织内建立强有力的宣传鼓动部门,集中宣传鼓动的人材,统一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9]。并重宣传与组织,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宣传工作顺利展开、宣传战线人才济济的重要原因。唐纵就此感慨道:“异党在野,办文化宣传的人,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本党在朝,优秀的人都做了官。惟本党平日无计划来培养这一类人才,则不能辞其责也。”^[29]

在日常工作中,负责对外宣传的报纸、通讯社、广播台及战报台,亦由宣传部统一领导^[2]。1941年7月,《中宣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又一次郑重申明,“今后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尤其是宣传部门”必须努力改进宣传工作,而且“报纸杂志的领导,应统一于党的宣传部”,宣传部负责人直接领导报刊编辑委员会,审查“下级的报纸杂志”。^[2]次年4月,中央书记处指令中央宣传部,统一审查延安的书报,会同中央出版局等有关部门,决定报刊编辑、出版、发行的方针与计划^[9]。此外,在大规模群众鼓动工作之前,宣传部应制定计划,召集宣传会议,进行必要准备,以便动员所有宣传机关及鼓动人员顺利完成任务,并在事后检查成绩,总结经验,纠正“自流主义现象”^[1]。由此可见,各级宣传部门是极其关键的,直接影响宣传工作的质量和成效。

宣传部领导作用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各区委和县委的宣传部部长亲自担任《解放日报》通讯员,与报社取得直接联系,同时组织同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替党报写文章,并负责所在区域的通讯工作,选定和培训工农通讯员^[2],借此维系中央和地方的信息网络。西北局就明确规定,各级宣传部“应将通讯员的组织和教育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业务之一,并应定期检查通讯员工作,向西北局和《解放日报》社汇报”。这类措施极大充实了党报内容,“对于解释和宣传西北局的政策,及其在各地的执行情况,均有显著的成绩”^[30]。整风运动期间,中宣部责令各级宣传部,营造“活的,生动的,与实际相联系的工作作风”,将执行情形和社会反响“随时报告中央宣传部”。^[9]在相当程度上,宣传部的自我净化和组织化的群众动员,是最鲜明的活动形式。

其实,宣传部不仅统一领导对外宣传工作,还要统一领导“一切宣传鼓动工作”,如国民教育、文化工作和对敌伪宣传等^[9]。在具体新闻业务方面,宣传部不仅负责稿件审查,以保证对外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而且还应与发行部“发生密切的联系”,推动党报发行和阅读^[1]。西北局宣传部还负责清查和登记“边区党政军所管辖的书店、图书馆、阅览室、民众教育馆等”,严禁反动刊物,审查外来书报和剧团工作^[30],这是组织驱动宣传的鲜活例证。后世研究者将宣传部看作“本世纪^①共产主义组织中最有效的部门之一”^[31],确是有理有据。

在注重宣传部门建设之外,中共中央着手加强根据地党的领导,密切中央与根据地的联系,以便理顺组织关系,进一步规范宣传工作的领导权。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

^①引文中的“本世纪”指20世纪。

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重申“统一对外宣传”,严厉批评擅自发表政见是“何等违犯党的组织原则,何等妨碍党的统一的恶劣行为!”^[9]这表明统一对外宣传的实质在于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因为“敌后斗争更加复杂,组织形式也是更加复杂,特别处于战争分散的局面的情况中,这种组织形式的复杂是容易引起独立主义的发生的……必须强调党的统一与一元化的领导。”^[13]

宣传的统一让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愈发强劲有力。1943年7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批驳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发起“宣传反击战”,使得时局重新趋向好转,空前提高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32]。西北局办公厅统战材料显示,对外宣传品作用相当突出,国民党三十七师某营长声称:“八路军报纸上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洛川绅士看到《评中国之命运》后称赞道:“印得漂亮,说得美”,不少人看到《新民主主义论》后认可“毛主席真伟大,真是革命的圣人”^[33]。对日伪的宣传战亦取得良好效果,“开展敌伪军工作,散发宣传品往往能得到很大成效,获得较确切的情报”^[21]。在1942年,“山东日军逃亡达六十三人,据说其中有二十三人曾经打听而没有找到八路军,五十四人自杀,个别敌兵自动出来向我投诚;在战场上拼命抵抗和不缴枪的现象亦有了改变。被我俘来之敌兵,愿意说出所属部队之状况,很快接受教育”。这些变化引人注目,罗荣桓由衷赞许:“反战同盟的影响与我宣传方式方法的改善是起到了相当作用的。”^[13]山东根据地对伪军的宣传攻势,以及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宣传,同样取得非常好的传播效果^[13]。粟裕也深有感触,在苏中根据地,由于正确开展伪军工作,“使伪军战斗力大大削弱了”^[24]。

尤为重要的是,统一宣传工作领导权,促使延安和其他各根据地协调一致,主动接受中外记者和国际友人的实地采访,积极对外传播根据地和中共抗战的真实情况,极大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英国记者贝特兰和美国记者王公达等,都热情颂扬抗日根据地^[34]。1944年,中外记者团在考察延安和晋西北等根据地之后,爱泼斯坦、白修道、M·武道、G·斯坦因和派西福拉斯等人在中外报刊发表《延安印象记》《我从延安归来》等文章,高度赞美中共抗战,引发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35]。周恩来事后评价说:“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36]

四、结语

全面抗战时期,为改变宣传“独立无政府状态”,中共中央多次强调“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这类指示源自建党初期的宣传纪律,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任何关系全国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中央没有发表意见之前,地方党组织“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8]。宣传工作之所以成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37],在相当程度上归结于中国共产党借助宣传纪律建设,推动宣传制度化。既有研究主要侧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六大纪律”,忽视了作为纪律体系组成部分的宣传纪律^[38],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史》同样很少专门探究宣传纪律建设。但从实际成效来看,统一对外宣传,全国性宣传听从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及其负责人“不可随便发表意见”,不仅是极重要的宣传纪律和指导策略,而且是赢得宣传战的关键。

以宣传统一消除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增进组织一致性,是组织宣传化的重要体现。与此同时,“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则使宣传工作呈现极为鲜明的组织化特色。利用组织力量驱动宣传,为提升宣传力奠定应有的物质基础和组织保障,证明中共中央清晰认识到:“宣传部是一个头,没有头,怎能把工作做好?”^[39]概言之,全面抗战时期“宣传组织化”和“组织宣传化”齐头并进,成为我党对外宣传工作的显著特征,这在统筹内宣和外宣过程中进一步彰显。1942年1月26日,毛泽东拟定《中宣部宣传要点》,明确要求“本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以便“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消除主观

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1],依然是融合宣传与组织,运用宣传力量推动组织发展。

全面抗战时期宣传纪律建设为日后宣传工作制度化奠定良好基础,尤其是中共中央反复警示各地党委及其负责人,重大问题必须事先征求中央同意,否则不能任意发表和广播,这让事前请示成为贯彻“统一对外宣传”的制度和组织保障。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48年6月正式确立“宣传工作中的请示与报告制度”^[20],进一步推进宣传工作规范化和纪律化。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宣传工作成效显著的重要动因,也是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严肃宣传纪律,确保正确舆论导向,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拿不准的问题要及时请示……重要舆情动向和新闻事故要及时报告”,是实实在在的“新闻出版工作之鉴”^[40]。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09;222-223;310;166;460;46-48;166-170;266-268;46-48;310-312.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1921—1949). 北京:新华出版,1980:98;20;35-37;114-115;98;99;105;119;120;126;98-99;99;114-117;132-133.
- [3]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第十一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52;760-761;766-769;760-765.
-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
- [5] 刘江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管理思想研究,苏州: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97-98.
- [6] 徐丙祥.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1921—1949).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8:129-131.
- [7]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577;821;627-628;1096.
- [8]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一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225;304;58;43;195-197;62-63.
- [9]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一——一九四二):第十三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72;37;31;434;139;372;110;136-138;370;316;139;434.
- [10] 方汉奇,宁树蕃,陈业劭.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359.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68-769;770-771.
- [12] 陈云. 陈云文选: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6.
- [13] 罗荣桓. 罗荣桓军事文选.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21-25;207;160-161;294.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52;260.
- [15] 罗迈. 论党内铁的纪律. 共产党人,1939,4:26-32.
- [16] 王敬. 延安《解放日报》史.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40;40.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九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67-368;368-369.
- [18] 熊辉,仰义方. 解放战争时期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考察. 中共党史研究,2014,4:28-38.
- [19] 陈毅. 陈毅军事文选.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252.
- [20]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一九四八).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92-193;202-205.
- [21] 黄瑶. 罗荣桓年谱.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12;206-207;222;243;304;205.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8-9.
- [23] 凯丰. 抗战中的宣传工作. 解放,1938,42:39-40.
- [24] 粟裕文选编辑组. 粟裕文选(1931.5—1945.8):第一卷.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291;189;346.

- [25] 李烈. 贺龙年谱.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37;342.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八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45;443.
- [27] 吴国桢. 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 吴修垣译.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212.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6.
- [29] 公安部档案馆.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355.
- [30]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 西安:西安新华职校印刷厂,1993:140-143;150-153.
- [31] 费约翰. 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李霞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2.
- [3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20.
- [33]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四). 西安:西安新华职校印刷厂,1993:421.
- [34] 钟小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史.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2:277-281.
- [35] 鲁登·爱泼斯坦. 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 上海:历史资料供应社,1946:7-98.
- [36]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南方局史.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305.
- [37] 毛泽东.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13.
- [38] 赵建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纪律建设.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24,4:69-79.
-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310.
- [40] 朱昌平. 新闻出版工作之鉴.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3-4.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paganda Discipli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o Jianguo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manded that all local Party committees and their leaders not express their opinions casually, and twice issued “unify external propaganda in the Base areas”, stipulating that foreign publicity must be asked for instructions in advance and obey the “party’s policies and decis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Furthermore,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was designated as the leader of “all external propaganda work”. 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ropaganda strategy, which played a key role in unifying the ideology,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whole Party, when defeating the enemy in the propaganda war and securing victory in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ue to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the unity of publicity, the foreign propaganda work of the CPC presente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e, standard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paganda system.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Full-scal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unify external propaganda”; ask for instructions in advance; Propaganda Department

■收稿日期:2024-10-23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责任编辑:肖劲草